

契约华工与种植园制

——荷属东印度日里地区种植园政治剖析

〔荷〕杨·布雷曼著

李明欢译

下



鹭江出版社

契约华工与种植园制

荷属东印度日里地区种植园政治剖析

〔荷〕杨·布雷曼著

李明欢 译

下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Jan Breman

Taming the Coolie B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译出

契约华工与种植园制

——荷属东印度日里地区

种植园政治剖析

〔荷〕扬·布雷曼著

李明欢 译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 19 号)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125 印张 3 插页 261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3-623-7

D·46 定价:10.00 元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中文版序言	(1)
英文版序言	(1)
第一章 丑闻爆发	(1)
第二章 种植园社会的形成	(13)
一、拓荒	(13)
二、攫土	(20)
三、劳工契约	(29)
四、种植园主的霸权	(35)
五、殖民政权与劳工制度	(40)
六、扩张	(48)
七、搜寻劳力	(53)
八、种植园利润	(67)
第三章 种植园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78)
一、欧洲人掌管大权	(78)
二、亚洲人中的“工头”	(84)
三、劳工	(92)
四、劳动组织	(100)
五、工资构成	(106)

六、工资支付与克扣	(112)
七、劳工生活条件	(117)
八、终结与续订劳工契约	(132)
第四章 统治与反抗	(136)
一、枷锁	(136)
二、软硬兼施	(140)
三、种植园主的权势	(148)
四、冲突与风波	(154)
五、苦力的个人反抗	(159)
六、严刑酷法	(167)
第五章 种植园社会与殖民秩序	(184)
一、种植园与边远地区	(184)
二、种植园主政治	(193)
三、种族歧视	(203)
四、野蛮的统治氛围	(209)
五、一个玩忽职守的政府	(217)
六、以暴力管理劳工	(223)
第六章 苦力问题	(231)
一、公开性与公众观念	(231)
二、行政调查与司法调查	(235)
三、官官相护	(244)
四、在荷兰爆发的政治辩论	(249)
五、殖民部内幕	(257)
六、余波	(264)
第七章 一仍其旧	(274)
一、评估	(274)

二、反思	(278)
三、种植园主与政府重修旧好	(283)
参考文献	(297)

第五章 种植园社会与殖民秩序

一、种植园与边远地区

建立于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种植园社会具有完全与众不同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包括：开发很迟；该地区位于殖民王国的边远地带；种植园农业兴起迅速并成为影响该地区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无论雇主或雇工，都是临时云集该地的。在此，我将首先剖析这些特点，接着探讨这些特点对于劳工关系的影响。种植园主享有绝对权威，种植园主与苦力关系中的暴力色彩，这一切在边远地带社会体制中固有的特色，于 19 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化成了具体的现实。由此看来，用“野蛮的东部”来描绘该地区当时的社会环境，可谓恰如其分。

“外省”一词本身即有其特殊的含义。19 世纪末，当荷兰在东南亚最终划定其殖民帝国的疆界时，对外省地区的开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开发外省的初期，足以引人注目的是：种植园系统中的上层（种植园主）和下层（劳工）几乎全都来自殖民地以外地区。最先涉足开发这一领域的无疑是一批私人企业家，他们看中该地区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于是利用这一有利的因素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不曾受到任何前资本主义机制的干扰。除了经济动因之外，国家利益也对开发该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 19

世纪上半期,苏门答腊是荷兰与英国双方的争夺对象。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通往西欧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这对于世界市场显然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马来亚作为一块有待开发的殖民地,在种植园农业的基础上获得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新加坡也迅速发展成太平洋上的重要转口贸易港,这一切都迫使荷属东印度政府必须采取相应行动。通往东亚的航道紧挨苏门答腊海岸,那里正在发生若干巨变,因此,只有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的控制,荷兰当局才能防止该地区完全倒向英国。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来自伦敦的抗议既不坚决,也不够及时,因此根本无以阻止荷兰的势力伸入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由于该地区某些更加危险的势力正日益增长,因此,允许荷兰有效地占领该岛似乎更为可取。根据 1824 年的“英荷条约”,苏门答腊岛业已被视为荷兰的“势力范围”(Reid 1969:281)。

然而,与外国势力的争夺并不是促使殖民政府填补边远地区真空地带的唯一原因,出于内政方面的考虑,殖民政府也认为必须对所有领地实行有效的占领和保护。向外扩张的要求还根源于爪哇人口过剩的状况已日益明显,广大农村人口毫无流动的希望,他们一直生活于贫困线之下——这至少是殖民当局的想法。因此,既然外岛地区有大片荒原,而且一旦开发后前景可观,那么,在外岛引进必要的技术,建立基本的管理体制,难道不是颇具吸引力的事业吗?在 20 世纪,一批具有强烈地缘政治学倾向的学者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提倡者,他们不断呼吁:殖民政府的建设发展重点应当从“资源耗尽”的爪哇,移到荷属东印度的其它岛屿上去,在那些地方,自然资源仍然取之不尽,而且,在那里没有使政府不堪重负的小农,靠这些人势必一事无成。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最先进入苏门答腊的种植园主可以被看成是以资本主义开发外岛政策的先驱者,

他们大获成功一事，成为殖民政府坚持这一后殖民时代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De Waard 1924:1035—7)。

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典型的种植园社会相比，位于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种植园企业所具有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该地区的种植园建立于资本主义发展相当晚近的时代，同时也是建立于殖民政治发生变动的时代。在东南亚的其它地区，尤其是在锡兰、印度(阿萨姆和尼尔吉里)、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菲律宾，种植园出现的时间也相当迟。这些地区的种植园中建立最早的也不过是在 19 世纪中叶，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得到充分发展的。因此，在美洲经过几个世纪才走完的历程，在亚洲仅用短短的几十年就完成了。西方式的管理办法和大批的劳动力被同时引进，构成了一种全新生产方式的基础，而早期殖民开发赖以进行的基础——农民却被完全搁置一旁。在以上列举的所有地区，这一新的种植园企业都集中于其各自所属的殖民国家的边远地区，对于各种种植园之间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对于它们之间原已存在或在发展中出现的差异，从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比较，其主要原因在于各殖民地均倾向于其宗主国，而这种倾向性也使各自的历史学家染上了偏见。

在印度建立的第一家责任有限公司是 1845 年成立的阿萨姆公司，在荷属东印度出现的第一家此类公司是 1869 年的日里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种植园企业，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两家公司的规模都发展得极其庞大，它们在各自领地内所拥有的权力都高居于当地的殖民政府之上。大约在 1885 年左右，当一切已成定局，即，种植园的烟草生产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这时，种植园主和政府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道路、铁路、港口、医院、政府机关等等，总之，致力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形成适合于一个较有秩序、较为发达的社会的基本框架，这一切后来都

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棉兰发展成一个高度西方化的都市中心，外观上颇具吸引力。日里地区本以其原始落后而闻名，现代文明的引进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这一进步也反映在该地区的社会生活上，到19世纪末，该地区的社会生活已变得十分高雅、时髦。“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社会并不是坠落的，那里并非生活着一群为所欲为的乌合之众。尽管基本环境仍和早些时相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Kooreman 1904—5:55)。克雷默在谈及新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何在该地区迅速滋长时，描绘出了一幅迷人的场景：携带女士互访，衣着举止入时，闲暇登山郊游，出入于剧院音乐厅——总之，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人社会中所能见到的一切，在此地也都能看到(Cremer 1889:56—60)。

然而，如何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其产品却是一桩令人捉摸不定的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如同其它任何单一经营的农产品一样，烟叶对于国际经济的波动极其敏感。在最初的一批种植园主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保持其独立性。19世纪80年代，烟草市场一度十分兴旺，随后到了90年代初，烟价忽然暴跌，虽然为时不久，影响却相当严重，这一事变促使种植园主第一次重组其企业结构。这次重组标志着这批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向成熟期的转化，伴随着这一转化，大型企业取代了重商型的小公司。到1925年，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129家烟草公司只剩下14家，而这14家公司拥有了该地区所有70个种植园(Volker 1928:31)。此时，烟草种植仅限于日里及其周边地区，即最初为种植烟草所开发的那些土地。该行政区的其它土地，随后引进了新的多年生作物，例如橡胶、麻和棕榈树，其重要性最终大大超过了烟草。但是，该地区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主要发生于20世纪，因此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有关这一时期的发展概况，可参阅斯托勒(Stoler)1985年的著作。)

日里地区自开发伊始就具有的浓郁的国际化色彩，依旧十分

明显,该地区与对岸马来亚地区的密切交往,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之前。从经济观点出发,甚至到了19世纪,这种关系仍然一直是由华人、而不是由英国商人从中维系。促使荷兰当局在日里地区设置行政机构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英国借沿岸地区华人之手,将势力渗透到这一地区(Reid 1970:291)。在种植园体系发轫之际,这些华人作为经济掎客极其有权有势。1876年,该地驻扎官报告说,此地的贸易实质上是华人的买卖,是由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商人一手操纵的。这些人不仅是商人,而且,正如本书第一章业已论述的那样,他们最初并且有意涉足农业生产领域。中国人在这方面未能如愿以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缺乏资金或技术,而是由于那些欧洲种植园主不愿意让任何非欧洲人插手种植园农业。华人被迅速地排斥于种植园主的圈子之外,因为种植园主联合会十分担心:

如果让那些东方外侨,尤其是中国人拥有了土地所有权,那么,许多目前在烟草种植园干活的苦力一俟契约期满,都将离开,另外受雇于他们自己的同胞,虽然据种植园主联合会分析,这些苦力给自己的同胞干活所得的工资,有时要比给欧洲种植园主当契约劳工所得的还少,但即便如此,那些契约华工还是宁愿在自己同胞手下当一名自由劳工(Boel 1903b:24)。

这些亚洲外侨想要插手市场贸易竞争的意图,同样也遭到抵制,因此,非经济性质的干涉确保了当地资本主义企业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当时,马六甲海峡两岸的华人正在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十分活跃的少数民族,但他们被迫局限于业已牢牢垄断的两个传统领域:零售贸易和中间商(Van langenberg 1977:59)。有关这方面的生动论述,可参阅德·瓦尔德的著述(De Waard 1924:1047—9)。

在苏门答腊东岸地区与海峡对岸的联络往来当中,华人的网

络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在该地区开发之初,当地欧洲人所需的一切,包括日常生活用品,都必须从槟榔屿进口。尼赫伊斯当年不仅从槟榔屿输入商品,而且输入苦力。开发土地所需的资金最初主要是由海峡殖民地提供的,而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产品也是经由这同一途径进入世界市场的。来往于日里的航船在许多年内一直经由槟榔屿,后来逐渐经由新加坡。在日里开发之初,要从巴达维亚直接抵达苏门答腊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巴达维亚到廖内的航程就需要5天,而这仅仅是旅程的第一段,从廖内每月只有一班船开往勿拉湾港。

那时候,日里几乎就是个完全孤立的地区,它与荷属东印度的其它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对外交往的地区主要是海峡殖民地,并经由那里与欧洲建立联系。而且,就连海峡对岸(即:马六甲)通用的货币,也成为日里地区标准的贸易通货,这些通货先是墨西哥银元,尔后是日本银元,接着是海峡殖民地的货币(Marinus & Van der Laan 1929:46)。

在这一现象背后,实际是不同国家和殖民地的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英国政府承认荷兰对苏门答腊东岸地区拥有主权,作为交换,英国政府则期望、并且事实上也为其臣民争得了在该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而且不受任何限制。

此外,在苏门答腊东岸地区所经历的大规模开发过程中,殖民政府仅仅起着一种十分温和的干预作用。最初建立于该地区的那些私人种植园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而该地区位于荷属东印度边远地区的地理位置又助长了这一倾向,因此,该地区的种植园主比之其它任何地区的企业主都更不乐意看到政府官员在此行使司法权。而且,该地区的种植园主们分属于多种不同的国籍,仅仅就此而言,他们也与荷兰当局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该地的劳动制度是

按照业已在马来亚地区形成的那套制度建立起来的，因此，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欧洲人社会与马来亚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十分密切。槟榔屿被看成是日里的“避难所”，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因为位于槟榔屿的英荷疗养院的股票主要掌握在日里的欧洲人手里。种植园主们常到槟榔屿去度假、旅行，因为“在那里随意漫步既不会令人觉得炎热，也不会使人感到疲倦，傍晚的习习凉风更令人舒适惬意，而且，在那里既不会看到什么苦力，也没有什么烟草!!!”(Westerman 1901:300)

进入 20 世纪之后，荷属东印度政府日渐卓有成效地限制了种植园主的特权，随着经济上保护主义倾向不断抬头，相应的投资与贸易政策相继实施(Allen & Donnithorne 1957:218)，苏门答腊东岸地区与马来亚之间的紧密关系逐步被削弱了。时至 19 世纪末，在烟草种植园主当中，荷兰人已明显居了上风，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由于担心那些外国雇员掌握了经营方法之后，可能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弄来资金以开辟他们自己的种植园，而荷兰各公司绝不希望助长此类竞争。据说，克雷默本人曾经保证要辞退在他手下的日里公司各种植园担任经理职务的德国人，无疑，其它那几家大公司必然仿效他的作法(“简评”，载《东印度指南》，1904:1554，并参阅 1901:1385—6)。然而，如果将荷兰资本在烟草种植中的集中化趋势作为普遍性结论，那将是不正确的，在 20 世纪初，随着种植多年生作物的风气兴起，欧洲(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和北美的资本大量投入，用以种植橡胶和棕榈，因此，苏门答腊东岸的种植园主阶层仍然保有浓郁的国际性色彩。有鉴于此，殖民当局严令其臣民忠实于他们所从属的政治制度。起初，殖民当局的这一命令并未能奏效，因此，事实上，最初似乎仍然是那些冒险家们在左右政府，他们要求政府支持他们设法获得并保有充足的劳工，要求政府制定法令以确保他们无限制地

得到土地，他们还要求，即使必须纳税的话，税额也只能是象征性的一点点。据闻，种植园主们甚至还口出如此狂言：如果我们的上述愿望不能得到满足，那我们就将在政治上投靠马来亚当局。

那些种植园主们包括了来自德国、英国等不同国度的外国人，他们狂妄地宣称，他们创造了日里的今天，也只有他们才掌握着日里的未来，他们给日里带来了金钱、繁荣，还有创业精神。而现在，荷属东印度政府却全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不为他们做任何事，甚至连驻扎官也设在遥远的邦加利斯，那地方的重要性根本比不上日里。当政府开始向他们征收并不太高的税款时，情况可就更糟了。种植园主们毫不掩饰他们对此的反感，他们大谈政府只把日里看成是搜刮钱财的好地方，却毫无回报之心……因此，他们当中酝酿着种种密谋。有人认为，如果日里成为相邻的英属殖民地的一部分，处境会比较好，这看法似乎得到好些人的赞许。因为，英国至少还为其殖民地做点好事，而荷兰却是一味盘剥榨取（《荷兰评论》1903：560—1）。

由此可见，种植园主们正是利用他们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向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而根据种种结果分析，看来他们的确善于此道。

苏门答腊东岸殖民地社会的最后一个显著特征是：到那里去的人谁也不打算在那儿长期呆下去。无论种植园主或苦力，都把那里视为暂时的栖身之处。相形这下，在建立于新世界的典型的种植园社会中，虽然劳工和种植园主也大都是来自它方，但他们到那里不仅是去谋生，而且也是去落户的。在苏门答腊东岸地区，以及在建立起了种植园农业的亚洲其它大多数殖民地社会中，诸如此类的情况绝无仅有。即使在度过了艰难的开拓岁月之后，日里仍然是那些白人职员的中转站，他们人人都指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大捞一

把,尔后腰缠万贯返回欧洲。那几个大亨,如尼赫伊斯和克雷默,就是榜样。克雷默回到荷兰时仅34岁,回国后他继续活跃于实业界和政治界。就另一方面而言,种植园中的苦力同样也签有一个有限期的合同,这一限期一般不超过3年。他们中不少人在契约期满前就已命归黄泉,或奄奄待毙,因为他们的工作量极其繁重,所得报酬却十分低廉,加上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更没有什么医疗保健可言。那些有幸在第一个契约期满之后依然活着的劳工,至少还得再干一个契约期;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契约所限,不得不如此。不过,种植园的管理者们实际上更愿意使劳工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即: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劳工,这些劳工自己支付他们的培训费用,而且,其实并不需要什么训练他们就已经能够胜任所分派的工作。苦力被禁止在种植园之外居住,极其低廉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既无法新组家庭,也无法将已有家庭的非劳动力人口带到种植园一起生活。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在海外、在农民的原居地进行的,而再生产所需的费用当然也是在那里解决的。种植园主感兴趣的只是将劳动力控制一个相当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年。

以下这个事例足以表明有多少种植园主仍然对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感到恐惧。60名契约期满的华工经要求后得到地区官员允诺,可以继续留居该地。他们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但是,种植园主当中却立刻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如此下去,日里岂不要出现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仿佛那是一股显而易见的祸水(Van Blankenstein 1929:48—9)。

关于劳工流动的资料几乎一无所存。有一份资料仅仅提及,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工人被解雇,另由新工人取代(Schuffner & Kuenen 1910:23)。该数字仅涉及本世纪之前若干年某公司下属种植园的情况,要对全地区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年代内工人流动的情况

作出全面的总结是不可能的。种植园内各阶层人口的流动性使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趋恶化。在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由于那里的种植园社会是以特殊的方式构成的，因此，既缺乏作为企业家阶层所应具有约束力，那些处于被雇佣地位的人们也没有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在荷兰代文特热带农业学院曾经举行过一次讲座，当时，一位具有亲身体验的演讲者向他的听众解释了为何爪哇种植园的生活比苏门答腊更具吸引力的原因：

在爪哇，人们自觉自愿地工作，因此既不会觉得烦闷无聊，也没有什么争争吵吵，虽然那些人并不怎么聪明能干，但决没有中国人的那些恶习。那些中国人性情乖张、狂妄自大，还拖着条长辫子。到日里去的人都希望尽早离开那里，而爪哇的情况则不同。在爪哇，人们与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和谐的，他们多少有种在此安家的感觉，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并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日益发生兴趣——但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日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去学中文，而且那里的中国人也都是些单身汉（*De Indische Mercur* 1894:527）。

在种植园经济已建立完成后很久，苏门答腊东岸地区依然保持着边远地区的社会特征，绝大多数人构成了庞大的社会基础，位于社会上层者寥寥无几，在两个世界之间横越着一道鸿沟，双方针锋相对，矛盾尖锐。

二、种植园主政治

苏门答腊东岸地区的确变成了一个种植园，而日里公司就是其最大的老板，因为，只是当该公司在棉兰设立了总部之后，棉兰才成为该地区之行政中心——此事难道不足以耐人寻味吗？种

植园主自认为是日里的缔造者，并且视日里为一己私产，并非毫无根据，在他们眼中，日里的主要基础设施，从公路、铁路、电话电报系统、自来水供应直到医院，都是由种植园业提供资助或一手包建的。棉兰位于种植园王国的中心，并且是其一切特征的缩影——

因此，棉兰是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绿茵茵的草坪中，矗立着一幢幢雪白的新楼房。正是棉兰四周那些蒸蒸日上的种植园，促成了棉兰的兴起。在我们整个东印度，棉兰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苏门答腊，即便在爪哇也难以找到与之相似的城镇。棉兰是充满欧洲情调的现代化城镇，它具有英格兰风味，无疑又受到临近的新加坡的影响。一株株棕榈树、无花果树和茉莉花树，经过热带雨水的冲洗后显得更加郁郁葱葱，在碧绿的树丛中，掩映着一幢幢漂亮的建筑：“白色俱乐部”（的确是名实相符）、邮局、市政厅、爪哇银行、农人旅馆、棉兰旅馆，还有各大公司那富丽堂皇的办公楼。这一幢幢白色的楼房傲然屹立，象征着日里的繁荣和兴盛，代表着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丰功伟业（Couperus 1924:33）。

棉兰是苏门答腊东岸种植园的中心，这里充满着一种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种力图获得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左右了种植园的开发史，并且依旧存在于属于这一阶层的每一个人身上。情性在此没有市场，棉兰人是富于进取性的。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而以西方人为大多数（Blink 1926:128）。

在上述这些写于20世纪的文字中，重点强调的是棉兰的异邦色彩。苦力不属于棉兰，他们是属于种植园的，即便政府当局也不过是配角而已。被若干相关公司簇拥着的日里公司，俨然如同国中之国，而该公司的最高首脑无异于君临日里的国王。“日里公司曾经